

---

---

# 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<sup>\*</sup>

——基于对宋孝武帝朝政治、文化变革的考察

何良五

**内容提要** 相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来说，南朝时期的皇权处于振兴过程当中。宋孝武帝是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，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君主专制，削弱士族的政治权力，极大地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；同时加强对文化的统治和管控，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，取得独尊地位。谢庄于孝建年间屡辞吏部尚书一职，是为了应对宋孝武帝的政治变革，其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则是南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剧烈冲突。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，表明高门士族在政治上失利后，进一步在文化上向帝王妥协，这也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。南朝皇权振兴对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，从谢庄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可见这种影响之一斑。

**关键词** 谢庄 宋孝武帝 政治抉择 文化变革 文学创作

从东晋到南朝，政治上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田余庆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，而南朝则回归到皇权政治<sup>①</sup>。然而皇权政治的回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宋文帝虽诛除傅亮、谢晦等辅政大臣以自掌权威，废黜彭城王义康以削弱相权，然而仍旧依靠若干高门重臣，士族势力仍盛。孝武帝即位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臣下之权，并且以严厉的杀伐措施来对付士族。皇权回升与士族权力之冲突，至孝武帝时渐至白热化，以致流血事件频发。谢庄在孝武帝起兵时立有大功，孝建初即被授以吏部尚书这一要职，然而谢庄多次因病以求解职，终被免官。孝武帝即位之初，谢庄颇有用心事之心，大明以后，虽在高位而远离权势。与此相反，谢庄在文学上则表现活跃，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。要更好地理解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，须将其置于宋孝武帝朝的政治、文化变革当中，并从纵向的，即南朝皇权与士权的变化关系来看。南朝帝王与士族的政治、文化关系处于消长变化之中，这一变化对南朝士族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而宋孝武帝朝正是这一消长变化的关键期，谢庄亦处于南朝士族文学转变的关口。

## 一 宋孝武帝朝的政治、文化变革

东晋南朝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时段，然而两者在政治上其实具有很大的区别。东晋可以称为门阀政治，而南朝则基本上回归到皇权政治。然而南朝皇权政治的回归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持续进行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的建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除此之外，宋孝武帝朝的政治变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成、流变及其学术体系建构研究”（项目编号21&ZD252）阶段性成果。

<sup>①</sup> 田余庆《东晋门阀政治》“自序”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页。

革也是南朝政治转变的关键，它的政治意义或许并不下于晋宋之变，所以历来学者多有论述<sup>①</sup>。

将宋文帝与宋孝武帝朝的政局稍作比较，便能发现二者的不同。宋文帝即位之初，内政由徐羨之、傅亮把持，荆州、南兖州重镇由谢晦、檀道济掌控，四人据此“以制持朝廷”<sup>②</sup>，这种权力结构与东晋门阀政治如出一辙。宋文帝诛杀徐、傅、谢三人之后，荆州重镇改由皇弟皇子担任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上游重镇对建康的军事威胁。中朝权力则颇为复杂，最初由高门士族王弘担任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独揽大权。身为外姓而掌此大权，王弘与宋文帝皆不自安，中朝权力便转移至彭城王刘义康之手。义康权力过盛，乃至与宋文帝相颉颃，最终被废黜。此后，文帝皆用数人共掌机密，最初为沈演之、庾炳之、范晔，后为江湛、何瑀之，后为江湛与徐湛之<sup>③</sup>。由此可见，宋文帝朝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只不过重要州镇改由宗室担任，中朝权力改由数名士族掌控，以相互制衡。宋文帝是在竭力维持皇帝、宗室、士族三种势力之间的平衡。

宋孝武帝即位后，这种平衡被打破了。孝武帝并不信任宗室与高门士族，他企图建立帝王专制的政权，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。在州郡方面，孝武帝割裂荆、扬二州以削弱州镇力量，尤其是分割荆州，极大地削弱了上游州郡对建康的军事威胁，改变了东晋以来的州镇格局。在中朝权力方面，一是省去录尚书事之职，二是设置两名吏部尚书，从官制上削弱宗室、大臣之权。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改革，除此之外，孝武帝又以寒人亲信为典签、中书舍人等小官，侵夺宰相之权。如此一来，便造成“南朝官制名实不符，高官如宰相、领军，有名而无实权，低官如舍人、制局监无名而有重权”<sup>④</sup>，而这正是“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”（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，第220页）。这种君主专制的政治格局在齐梁以后更加坚固，而这一格局的形成，实自宋孝武帝始。孝武帝死后，某些具体措施虽被修正（重置录尚书事，吏部尚书改为一），但加强君主专制的意识、“寒人掌机要”的政策没变，且得到进一步深化。宋明帝时，幸臣之权远超孝武帝时，“（阮）佃夫、王道隆、杨运长并执权柄，亚于人主。巢（尚之）、戴（法兴）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”<sup>⑤</sup>。直至齐武帝、梁武帝，仍以寒幸、次等士族掌握政治大权。总之，宋孝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朝的政治权力结构，是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。

除政治变革外，宋孝武帝朝的文化变革也值得重视。刘裕代晋造宋，从门阀士族手中夺取了政治、军事权力，然而在社会、文化上，门阀士族依然具有超越皇权的力量。刘裕出身低微，文化浅薄，与郑鲜之清谈被驳难至“变色动容”<sup>⑥</sup>，由于文学才能低下而由谢晦代为作诗，由于书法不佳而专写大字以藏拙<sup>⑦</sup>。与之相反，高门士族则在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。刘裕企图代晋，需要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，则其自身必须尊重甚至迎合士族文化。史称“高祖少事戎旅，不经涉学，及为宰相，颇慕风流”<sup>⑧</sup>，原

① 古人论述如沈约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四《恩幸传》（中华书局2018年版，第8册，第2527—2528页）、萧子显《南齐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六《幸臣传》（中华书局2017年版，第3册，第1075—1076页）、李延寿《南史》卷七七《恩幸传》（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6册，第1914页）、裴子野《宋略·总论》（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5册，第423页）、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（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1册，第581—582页）等，当代学者论述如严耀中《评孝武帝及其政策》（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1987年第1期）、何德章《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》（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3期）、赫兆丰《大明二年的转折——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、瓦解与寒人上位》（《中南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5期）等。

②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四四《谢晦传》，第5册，第1474页。

③ 参见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七一《徐湛之传》，第6册，第2020页。

④ 万绳楠整理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，黄山书社1987年版，第224页。

⑤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四《恩幸传》，第8册，第2540页。

⑥⑧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四《郑鲜之传》，第6册，第1856页。

⑦ 关于刘裕文化素养之浅薄，参见王永平《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修养及其文化倾向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9年第2期。

因或在于此。有学者称“‘宋武爱文’是被动地‘爱文’”<sup>①</sup>，确实较有见地。因此，尽管刘裕文化修养相当浅薄，却仍表现出对清谈与文学的极高热情，其背后的政治意味较浓。

刘宋建立三四十一年后，皇室的文化修养也在逐渐提高。宗室第一代文化修养之浅薄已如前述，至第二代，好文之风逐渐兴盛。如宋武帝第二子义真，“聪明爱文义”<sup>②</sup>，与谢灵运、颜延之等人友善。第三子宋文帝自称“少览篇籍，颇爱文义，游玄玩采，未能息卷”<sup>③</sup>，且善书法<sup>④</sup>。第五子义恭亦“涉猎文义”<sup>⑤</sup>，并有诗文存世。长沙王刘道怜第二子义庆“爱好文义，才词虽不多，然足为宗室之表”，以致“太祖与义庆书，常加意斟酌”<sup>⑥</sup>。至第三代，爱好文学已成风气。文帝第二子浚、第三子骏、第四子铄、第七子宏、第九子昶、第十一子彧、第十二子休仁等皆爱好文义<sup>⑦</sup>。宋武帝刘裕的文化修养很低，“颇慕风流”中的“慕”字，表现出刘裕对士族文化的欣羨、仰慕之情。宋文帝的文化修养有所提高，从他与谢灵运、颜延之等人的交往、对话来看，大致能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士族文化。至孝武帝时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相较于宋武帝、文帝，孝武帝的文学修养大为提高，《南史》称其“读书七行俱下，才藻甚美”<sup>⑧</sup>。元嘉二十六年（449）宋文帝“幸丹徒，谒京陵”<sup>⑨</sup>，时为武陵王的刘骏献上《巡幸旧宫颂》十二章<sup>⑩</sup>，辞藻华美。大明六年（462）殷淑妃薨，孝武帝作《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》，文辞凄怆。此外，《幸中兴堂钱江夏王诗》有“阴云掩欢绪，江山起别心”<sup>⑪</sup>的精巧之句，《咏史诗》颇多慷慨纵横之气，另有《游覆舟山诗》《登作乐山诗》《登鲁山诗》等写景状物之作。总的来看，孝武帝的文学才能在刘宋帝王之中可以称冠，并且不下于一般士族。当然，较之于谢庄、鲍照等士族中的一流文人，宋孝武帝的文学才能自然是不如的。然而孝武帝身为一国之君，对其文学才能极为自负，想要超越士族，在文化方面称尊。今存《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》一首，全诗如下：

九官盛事予疏纡（帝），三辅务根诚难亮（扬州刺史江夏王义恭）。策拙粉乡惭恩望（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），折冲莫效兴民谤（领军将军元景）。侍禁卫储恩逾量（太子右率畅），臣谬叨宠九流旷（吏部尚书庄）。喉唇废职方思让（侍中偃），明笔直绳天威谅（御史中丞颜师伯）。（《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宋诗》卷五，中册，第1224页）

《柏梁台诗》相传为汉武帝于柏梁台上与群臣联句而成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指出其为后人拟作，近现代学者对诗之真伪、写作时间颇有争论<sup>⑫</sup>。《柏梁台诗》所述汉武帝与群臣联句赋诗之事或非事实，然

① 李磊《义熙政局与“宋氏以文章闲业”之缘起》，《社会科学》2016年第11期。

②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一《武三王传》，第6册，第1788页。

③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五《索虏传》，第8册，第2570页。

④ 《南齐书》载：“太祖善书，及即位，笃好不已。”又载王僧虔论书云：“宋文帝书，自云可比王子敬，时议者云‘天然胜羊欣，功夫少于欣’。”（《南齐书》[修订本]卷三三《王僧虔传》，第2册，第660—661页）

⑤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一《武三王传》，第6册，第1793页。

⑥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一《宗室传》，第5册，第1609—1610页。

⑦ 参见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九《二凶传》（第8册，第2675页）、卷八《明帝纪》（第1册，第186页）、卷七二《文九王传》（第6册，第2047页），《南史》卷一四《宋宗室及诸王传下》（第2册，第403页），魏收《魏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九《刘昶传》（中华书局2018年版，第4册，第1429页）。

⑧ 《南史》卷二《宋本纪中》，第1册，第55页。

⑨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《文帝纪》，第1册，第103页。

⑩ 严可均《全宋文》据《艺文类聚》辑得第四（半章）、六、八章，日藏弘仁本《文馆词林》收录全文十二章（参见许敬宗编，罗国威整理《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114—115页）。

⑪ 逯钦立辑校《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宋诗》卷五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中册，第1221页。

⑫ 参见孙正军《〈柏梁台诗〉成篇时间新论——基于文本出处和官职描述的综合考察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8年第2期。

而这种诗歌形式确实能够体现帝王政治上的权威与文化上的雅致。孝武帝即位后不久<sup>①</sup>，于华林都亭举行曲水宴，与谢庄等人仿效柏梁体联句赋诗。孝武帝起句曰“九宫盛事予疏纡”，确有豪迈、自负的帝王之气，显示了皇帝对朝政、宴会的主导和掌控。彭城王刘义恭、吏部尚书谢庄等人结合自己的职位，表达忠于职守的决心、未能尽职的惭愧以及对皇帝隆恩的感激和愧疚。这种仿效柏梁体联句作诗的行为，显示了皇帝的绝对权威，以及臣子对皇权的服从，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。此外，仿效柏梁体联句赋诗又是一种文化活动，它显示了孝武帝对汉武盛世的欣羨，而宫廷文学<sup>②</sup>正是在汉武帝时达到第一个高潮。东晋之时，皇权旁落，无力干预士族文化。与此同时，高门士族以门阀政治为依托，形成了适应于门阀士族的文化交往方式，这种文化及生活方式超越皇权，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，所以东晋一朝极少宫廷文学之作<sup>③</sup>。入宋以后，门阀政治逐渐衰微，士族的政治、军事势力大为减弱，但这种稳定、封闭性的士族文化仍得以延续，并且与门第观念结合，常常凌驾于皇权之上<sup>④</sup>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便想要改变这一状况，加强对士族文化的领导与掌控，《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》正反映了孝武帝的这一努力。

此外，据《宋书·临川王义庆传》附《鲍照传》载：“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。上好为文章，自谓物莫能及，照悟其旨，为文多鄙言累句，当时咸谓照才尽，实不然也。”<sup>⑤</sup>《南齐书·王僧虔传》载：“孝武欲擅书名，僧虔不敢显迹。大明世，常用掘笔书，以此见容。”<sup>⑥</sup>孝武帝欲在文学、书法方面称尊，士族虽然在文化上超越帝王，但畏于皇权之逼，不得不厚自贬损以保全性命。由此可以想见，孝武帝欲在文化上称尊的意志是何等强烈，而士族面对皇权之逼又是何等的恐惧卑微。从宋武帝到宋文帝朝，高门士族在政治、军事方面势力大减，在文化上却一直保持着超越皇权的优势地位。然而到了宋孝武帝朝，这种优势地位不得不以被动的形式逐渐失去，高门士族必须在文化上向孝武帝俯首称臣。

综上所述，孝武帝朝实为南朝政治、文化变革之关键，亦为南朝皇权与士权此消彼长、激烈冲突之关键。政治上，皇帝起用寒人小官以夺取士族高官之权，士族成为位高而无权的帝国官僚。文化上，皇帝以政治权力为后盾，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。谢庄是孝武帝朝较为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，他的政治抉择及文学创作，与孝武帝朝的政治、文化变革具有重要联系。

## 二 谢庄请辞吏部尚书的原因分析

谢庄出身于东晋南朝一流高门，其父谢弘微在宋文帝时颇受重用，与王华、王昙首等号曰“五臣”。谢庄大概于元嘉十七年（440）以始兴王浚法曹行参军起家（此年始兴王“置佐领兵”，谢庄二十岁），此后转为太子舍人、庐陵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太子中舍人，大致于元嘉二十年（443）转为庐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（此年庐陵王出为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，谢庄二十三岁），又转为随王诞谘议参军，至元嘉二十九年（452）转为太子中庶子，由地方军府进入朝廷任职。

谢庄一生之转折是在元嘉三十年（453）。其年二月，太子刘劭弑宋文帝而自立，江州刺史武陵王

① 此事发生在孝建二年十月左右（参见曹道衡、沈玉成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》，中华书局2003年版，第351页）。

② 本文以袁行霈《中国文学概论》中的“宫廷文学”概念为主，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，将宫廷文学界定为：以帝王的宫廷为中心，由帝王本人及其御用文人、朝廷大臣创作的，主要描写宫廷生活，用以歌功颂德、点缀太平、娱乐享受的文学作品。

③ 参见何诗海《东晋应制诗之萧条及其文学史意蕴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1年第2期。

④ 谢灵运、范晔皆以门第和文化优势倨傲于宋文帝，被文帝所杀。王僧达自负门第，上表时“文旨抑扬”，被免官。高门士族的门第优越感往往联系着文化优越感，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专制皇权的挑战。

⑤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一《宗室传》，第5册，第1612页。

⑥ 《南齐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三三《王僧虔传》，第2册，第656页。

骏率众入讨。当时刘劭以谢庄为司徒左长史，而武陵王骏“密送檄书与庄，令加改治宣布”<sup>①</sup>。于时何去何从，众人并非毫无犹豫<sup>②</sup>。谢庄身在建康，毅然附同刘骏，并遣腹心门生到江州表明诚心。刘骏称帝后，随即以谢庄为侍中，次年迁左卫将军，拜吏部尚书。此前，谢庄如一般高门士族“平流进取”，最高做过太子中庶子，官五品；而一二年间，迁侍中、吏部尚书，为三品高官，且皆为清贵之职。谢庄时年三十四，可谓早达。

孝建元年（454），谢庄代颜竣为吏部尚书。吏部尚书掌管士人起家和官吏任免、升降、调动等事务，位高权重，被视为美职。然而据《宋书·天文志》载：“孝建元年十月乙丑，荧惑犯进贤星。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，不许。”<sup>③</sup>可知，谢庄拜吏部尚书之后不到一年，便上表解职。此外，谢庄又致书于江夏王义恭以求解职，称“下官新岁便三十五”<sup>④</sup>，则知此文亦作于孝建元年。又称“前时曾启愿三吴”，“入年便当更申前请，以死自固”<sup>⑤</sup>，可知孝建年间谢庄的确多次以疾辞官，甚至不惜以死相逼。孝建三年（456），谢庄由于辞疾过多，被免官。在短短两三年内，如此频繁地因病<sup>⑥</sup>以求解职，乃至以死相逼，确实值得注意。孙明君《谢庄〈与江夏王义恭笺〉释证》对此有所发覆，以为：“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庄‘意多不行’，‘唯奉行文书’而已，况且当朝皇帝宠爱寒人、打压士族阶层，士族们在皇帝的淫威下度日如年，是以身患痼疾的谢庄下定决心要辞去处在聚光灯下的吏部尚书一职。”<sup>⑦</sup>此说确为有识，然犹有未尽，谢庄以疾辞职一事，实与孝武帝厉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关，亦关乎南朝政局之大变，故此处稍作申发。

如前所述，宋孝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，在内朝、外镇两个方面进行了大力的改革。内朝方面，以省去录尚书事和设立两名吏部尚书这样的制度改革最为重要。《宋书·百官志上》载：“录尚书职不总……凡重号将军刺史，皆得命曹授用，唯不得施除及加节。宋世祖孝建中，不欲威权外假，省录。”<sup>⑧</sup>同书《江夏文献王义恭传》载：“世祖以义宣乱逆，由于强盛，至是欲削弱王侯。义恭希旨，乃上表省录尚书。”<sup>⑨</sup>《宋书·孝武帝纪》载：“（孝建元年六月）戊子，省录尚书事。”<sup>⑩</sup>据此可知：其一，孝武帝即位不久便欲收臣下之权，这种意志较为强烈，故为臣下所知；其二，省录尚书事是由在任者江夏王义恭主动上表提出的，故得施行。除录尚书事外，吏部尚书亦有重权，孝武帝对此有所忌惮，颇为忧虑<sup>⑪</sup>。而吏部尚书原本与录尚书事共同商定选任事宜<sup>⑫</sup>，录尚书已省，则选举重权归于吏

①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八五《谢庄传》，第8册，第2380页。

② 《宋书》载：“三十年，元凶弑立，世祖入讨，普檄诸州郡，又符郡发兵，僧达未知所从。”（《宋书》[修订本]卷七五《王僧达传》，第7册，第2136页）

③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二六《天文志四》，第3册，第819页。

④⑤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八五《谢庄传》，第8册，第2384页。

⑥ 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紧急护理科主任大卫·J·奥班认为谢庄患有遗传性的内分泌紊乱症状，可能最终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、慢性心力衰竭、肝充血以及末期肾病（参见陈美丽著，贾骄阳译《高门与孤寒：南朝谢氏族人的升沉》，《铜仁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3期）。

⑦ 孙明君《谢庄〈与江夏王义恭笺〉释证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5期。

⑧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三九《百官志上》，第4册，第1339页。

⑨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一《武三王传》，第6册，第1799页。

⑩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《孝武帝纪》，第1册，第125页。

⑪ 参见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八五《谢庄传》（第8册，第2385页）、卷八四《孔凯传》（第7册，第2363页）。孙明君《谢庄〈与江夏王义恭笺〉释证》论之甚明，亦可参见。

⑫ 《宋书·谢庄传》载：“（孝武帝）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：‘……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，良以一人之识，不办洽通。’”（《宋书》[修订本]卷八五《谢庄传》，第8册，第2386页）《宋书·蔡廓传》载：“征为吏部尚书。廓因北地傅隆问亮：‘选事若悉以见付，不论；不然，不能拜也。’亮以语录尚书徐羨之，羨之曰：‘黄门郎以下，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复厝怀；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参同异。’廓曰：‘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。’遂不拜。”（《宋书》[修订本]卷五七《蔡廓传》，第5册，第1714页）可知吏部尚书与录尚书事共掌选事。

部尚书一人之手，其权势不言自明。分置吏部尚书时在大明二年（458），孝武帝与江夏王义恭解释：“自中分荆、扬，于时便有意于此，正诤改革不少，容生骇惑。尔来多年，欲至岁下处分，会何偃致故，应有亲人，故近因此施行。”<sup>①</sup>“中分荆、扬”时在孝建元年六月，可知孝建元年孝武帝便有分置两名吏部尚书之意。孝武帝欲省录尚书，江夏王义恭便“希旨”上表请省；欲分置两名吏部尚书，谢庄焉能不知？谢庄此年因天文之变上表解职，又因病致书于江夏王义恭求解选职，当与此相关。“尔来多年，欲至岁下处分”，说明孝武帝一直没有打消这一念头，所以孝建年间，谢庄不断上表解职。

孝建年间实为南朝“寒人掌机要”的起始期，这一政治转变对吏部尚书谢庄的影响尤其巨大。赵翼指出“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”<sup>②</sup>，然而这一变化实自宋孝武帝孝建年间开始，故《宋书·恩幸传》云“孝建、泰始，主威独运”<sup>③</sup>。在孝建元年谢庄接任以前，吏部尚书一直都是重要的实权职位。宋文帝一朝，任吏部尚书者有王惠、王球、何尚之、庾炳之、萧思话、沈演之等人，他们或“性好举才，申济屈滞”<sup>④</sup>，或“领选既不辑众论，又颇通货贿”<sup>⑤</sup>，皆掌实权。至于谢庄的前任颜竣，也是“留心选举，自强不息，任遇既隆，奏无不可”<sup>⑥</sup>，而谢庄则是“意多不行”。实际上，正是从谢庄担任吏部尚书开始，宋孝武帝才“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，上皆与（戴）法兴、（巢）尚之参怀”，导致“法兴、（戴）明宝大通人事，多纳货贿，凡所荐达，言无不行，天下辐凑，门外成市”<sup>⑦</sup>。也就是说，在孝建元年谢庄任职以后，吏部尚书开始由实权职位变为虚衔，而众人仍按以前的状况来要求谢庄，这无疑会使在位而无权的谢庄遭受较大的舆论压力（参见《谢庄〈与江夏王义恭笺〉释证》）。在下承受众人的非议，在上受到孝武帝的提防、猜忌，所以谢庄就任不久便以天文异常而求解职，又因病辞官，甚至以死相请。孙明君认为：“作为堂堂吏部尚书的谢庄，只是一个‘意多不行’而‘唯奉行文书’的傀儡角色，他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了宾客们的怀疑。我们相信，这才是谢庄不愿居选部的根本原因。”（《谢庄〈与江夏王义恭笺〉释证》）孙氏所言固然有理，但从孝武帝对吏部尚书一职的忌惮与防范，以及江夏王义恭迫于孝武帝之逼而主动请求省去录尚书一事来看，谢庄孝建年间屡次辞任吏部尚书，主要还是迫于孝武帝的皇权之逼，想要远离权势之位、疑忌之职，以明哲保身。

此外，皇权与士权之间的冲突至宋孝武帝时尤为激烈，孝武帝朝拉开了南朝“恐怖政治”的序幕<sup>⑧</sup>。宋文帝朝，徐羨之等人由于把控政权、“制持朝廷”而被杀，谢灵运、范晔等人以谋反大罪而被杀，但士族仍旧享受较高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<sup>⑨</sup>。而孝武帝不仅以多种手段收回或打压士族权力，而且肆意杀伐，“睚眦之间，动至罪戮”<sup>⑩</sup>。门第一流的王僧达由于“不逊”“终无悛心”而被借故杀

①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八《谢庄传》，第8册，第2387页。

② 赵翼撰，曹光甫点校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八“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”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上册，第153页。

③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四《恩幸传》，第8册，第2528页。另有学者的研究可为佐证，参见王铿《论南朝宋齐时期的“寒人典掌机要”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95年第1期）。该文对宋齐二朝皇帝和大臣、寒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，指出“文帝一朝，是重用大臣的一朝，寒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”，而宋孝武帝则起用戴法兴、戴明宝等人。

④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三《沈演之传》，第6册，第1844页。

⑤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三《庾炳之传》，第5册，第1656页。

⑥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七五《颜竣传》，第7册，第2144页。

⑦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四《恩幸传》，第8册，第2529—2530页。

⑧ 参见陶希圣《南朝士族之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（上）》，《食货杂志》1974年第7期。

⑨ 宋文帝朝，仍有许多高门士族得以参政议政，具有较高的政治权力（参见《南朝士族之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（上）》《论南朝宋齐时期的“寒人典掌机要”》）。

⑩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九四《恩幸传》，第8册，第2529页。

害，极受信任的颜竣由于谏争恳切、议论人主得失而被孝武帝所杀。以上两人尚且是被以谋逆罪名处死的，周朗则是由于上书指斥时弊而得罪孝武帝，被冠以“居丧无礼”的罪名而被加害；羊戎则由于“与王僧达谤议时政，赐死”<sup>①</sup>；沈怀文多次触怒孝武帝，最终也因为免官禁锢后卖宅还乡而被杀。正是由于孝武帝异常残暴、肆意杀戮，致使江智渊忧惧而死，江夏王义恭、柳元景等人虽居高位而常虑祸及，直至孝武帝薨方才庆幸免于横死。除此以外，孝武帝经常对群臣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凌辱，这对士族的人格也是极大的侮辱<sup>②</sup>。总而言之，孝武帝采取非常极端的措施来收归臣下之权，急切地想要树立皇帝权威而对士族进行过于严厉的打压，使得帝王与士族之间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。因此，孝武帝朝的恐怖气氛远超宋文帝时，士族在皇帝面前丢失了政治权力和应有的尊严，且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命危险。

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，顺从皇帝、远离权威，是比较高明的做法。孝建三年被免职之后，谢庄于大明元年（457）起为都官尚书。次年，置吏部尚书二人，谢庄与顾凯之并补选职。吏部尚书既置二人，则其权力、职责皆分半，谢庄任此职，也可以视为与孝武帝达成和解。大明年间，谢庄屡居高位，但已无政绩可言，亦不像孝建初年那样建言献策。孝武帝每宴集，在坐者皆令沉醉，并令大臣互相嘲戏，沈怀文素不饮酒，又不好戏调，被孝武帝所忌恨。谢庄谓沈怀文曰：“卿每与人异，亦何可久。”<sup>③</sup>可知谢庄处于孝武一朝，不过与世俯仰，保全求生而已。可知，谢庄于孝建初年反复请求解除吏部尚书一职，于大明年间不关心政事、明哲保身，根本原因在于孝武帝朝的政治变革。谢庄的政治选择，当被置于南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变化中来观照。它反映了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，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败退。尽管谢庄在政治上尽量远离实权，但在文学上却有意靠近帝王，成为宋孝武帝朝宫廷文学之首。

### 三 谢庄的宫廷文学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

谢庄年少便以文学著名，七岁能作文，二十五岁被范晔称赞于文字声韵“最有其分”<sup>④</sup>。元嘉二十七年（450），北魏李孝伯向张淹访问谢庄及王徽，更可见其声名远播。元嘉二十九年（谢庄三十二岁）以前，谢庄主要担任外镇藩王的僚佐，仅在元嘉十七年至二十年（谢庄二十至二十三岁）担任过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舍人等职（在此期间还做过始兴王行参军和庐陵王文学）。长期的外任经历为谢庄游历山水提供了条件，使他写下了《游豫章西观洪崖井诗》《自浔阳至都集道里名为诗》《怀园引》等山水之作；而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很短，且职位低、年龄小，因此很难参与到宫廷文学写作当中。直到元嘉二十九年，谢庄才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参与宫廷文学写作，但也仅有《赤鸚鵡赋应诏》《侍宴蒜山》存世。然而谢庄此前已被范晔所知，名声传于北魏，可知他已经创造了较多的文学作品。由此可以推断，谢庄在宋文帝朝的创作应当主要是山水题材，宫廷文学作品不会很多。然而到了宋孝武帝时代，谢庄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作品，并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。

谢庄现存的宫廷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一是在游览、节日、礼仪、宴会等场合的应诏之作，如《侍宴蒜山诗》《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》《侍东耕诗》；二是贡物、祥瑞题材写作，如《舞马赋应诏》《和元日雪花应诏诗》《瑞雪吟》；三是为皇室重要人物所作的哀策铭谏等文，如《宋孝武宣贵妃谏》《豫章长公主墓志铭》；四是郊庙歌辞，如《宋明堂歌》。谢庄现存诗歌十六首，其中宫廷文

①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四《羊玄保传》，第5册，第1676页。

② 参见李磊《六朝士风研究》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09—210页。

③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八二《沈怀文传》，第7册，第2309页。

④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九《范晔传》，第6册，第2001页。

学之作八首；赋四篇，其中应诏之作两篇；诔两篇、哀策两篇，皆为应诏之作。总的来看，宫廷文学作品在谢庄现存作品中占据很大比重。谢庄的宫廷文学作品不仅数量众多，而且大多比较重要。如受诏所作的《宋明堂歌》，与宋孝武帝“制礼作乐”的举措相关<sup>①</sup>；《舞马赋》将“文学书写与现实政治话语结合”<sup>②</sup>，满足了孝武帝自我夸饰的需要；《宋孝武帝宣贵妃诔》极得孝武帝喜爱，乃至“起坐流涕”，并且“都下传写，纸墨为之贵”<sup>③</sup>。此外，皇太子妃何氏薨，“皇帝伤总辇之掩彩，悼副衽之灭华”<sup>④</sup>，命谢庄作哀策文；刘琨之死于竟陵王刘诞之乱，孝武帝亦使谢庄为之写作诔文。总而言之，谢庄的宫廷文学写作，题材、场合丰富多样，或为《舞马赋》这种国家层面的宏大主题，或为《瑞雪吟》《和元日雪花应诏诗》之类为满足皇帝虚荣心而写的祥瑞文字，或为《宋孝武宣贵妃诔》这种与皇帝私人情感密切相关的文字。可以说，从国家层面到皇帝个人层面，从官方的、政治性的写作到非官方的、私人性的写作，谢庄都参与其中。如此种类繁多且意义重大的写作，表明谢庄成为宋孝武帝朝当之无愧的宫廷大手笔。裴子野《宋略·总论》谓孝武帝朝“一时之风流领袖，则谢庄、何偃、王彧、蔡兴宗、袁颢、袁粲”<sup>⑤</sup>，将谢庄置于“风流领袖”之首，也可说明谢庄的宫廷文学地位。

谢庄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作品，成为宋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，在南朝文学史上有两个重要意义：其一，标志着南朝高门士族在政治上败退之后，在文化（主要是文学）上的进一步败退；其二，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由山水文学向宫廷文学转变。

东晋时期，门阀士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平行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力，在文化上更是超越帝室。刘裕代晋造宋，高门士族的政治、军事权力有所衰弱，但在文化上仍旧可以睥睨刘宋皇室。典型代表如出身于一流高门的谢灵运，他的家族（尤其是他的祖父谢玄）在东晋立下了赫赫大功，谢灵运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其祖上一般的功业，然而在刘宋新朝，他的抱负注定无法实现。在宋文帝朝，谢灵运“唯以文义见接，每侍上宴，谈赏而已”<sup>⑥</sup>，说明宋文帝不愿谢灵运插手政事，只是想让他做一名宫廷侍从文人，但这显然不符合他的预期。元嘉十年之内，谢灵运仅有《从游京口北固应诏》一首应制诗存世。此诗在称赞皇帝、颂扬盛世之后，结尾称“顾己枉维繫，抚志惭场苗。工拙各所宜，终以反林巢。曾是紫旧想，览物奏长谣”<sup>⑦</sup>，表达了辞官归隐的想法，并且是长久以来的“旧想”。在从游的公共场合以及应诏诗这一政治性较强的文体中，表达辞官归隐的请求，确实较为少见，这表明谢灵运并不愿意充当宋文帝的侍从文人。谢灵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，然而在经济和文化上，他有足够的自负的资本，所以他拒绝了宫廷文人的身份，“终以反林巢”，创作了大量表现士族优越意识的山水作品。

代替谢灵运担任宫廷大手笔的是颜延之。在文学才能上，颜、谢二人不相伯仲，然而在家世门第上，二人不可同日而语。谢灵运在《述祖德诗》《撰征赋》等作品中反复称颂其祖上功德，称谢氏为“冠族”（《谢灵运集校注》，第19页）、“华宗”（《谢灵运集校注》，第7页）。颜延之父、祖官位皆不显达，骂其子颜竣“出粪土之中，而升云霞之上”<sup>⑧</sup>，颜竣自称“东州凡鄙，生于微族，长自闾阎，不

① 参见李晓红《“以数立言”与九言诗之兴——谢庄〈宋明堂歌〉文体新变考论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4期。

② 林晓光《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——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9年第2期。

③ 《南史》卷一一《后妃传上》，第2册，第324页。

④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宋文》卷三五，第4册，第500页。

⑤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梁文》卷五三，第5册，第423页。

⑥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七《谢灵运传》，第6册，第1938页。

⑦ 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58页。

⑧ 《南史》卷三四《颜延之传》，第3册，第881页。

窥官辙，门无富贵，志绝华伍”<sup>①</sup>，皆可见颜氏门第之低。宋文帝在选择宫廷文人时，首选其实是一流门第的谢灵运，由谢灵运在公开场合写作颂扬皇帝、自我贬低的宫廷文学作品，更能显示士族身份的低微与皇帝权威的强盛。谢灵运拒绝担任纯粹的宫廷文人，显示出高门士族在文化上不向帝王低头的傲气，而门第较低的颜延之则做出妥协，在政治、文化两方面向皇帝俯首称臣。

除颜延之外，在宋文帝朝大量写作宫廷文学的士族文人并不多，有的高门士族并不甘心充当侍从文人。比如范晔，出身于顺阳高门，其父范泰仕至左光禄大夫、特进。范晔自幼好学，经史、文学、书法、音律皆善，无论是门第还是文化，都堪称上流士族。范晔今存《乐游应诏诗》一首，乃元嘉十一年（434）宋文帝裸饮于乐游苑，普诏群臣所作。除此之外，范晔别无应诏诗存世。范晔自称：“吾思乃无定方，特能济难适轻重，所禀之分，犹当未尽。但多公家之言，少于事外远致，以此为恨，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范晔对其文才极为自信，但是他更想写作的是“事外远致”之文，而非“公家之言”。所谓“公家之言”，应当包括《乐游应诏诗》之类宫廷文学作品在内。除文学外，范晔也不愿以音乐侍奉皇帝。范晔善弹琵琶，宋文帝多次暗示范晔为其弹奏，范晔假装不知，只有宋文帝亲自歌唱，范晔才为之弹奏，文帝歌毕，范晔便不再弹奏。这表明，范晔并不愿以文学、音乐才华侍奉文帝，显示出高门士族在文化和人格上的倨傲。

总之，宋文帝朝除了颜延之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之外，高门士族如谢灵运、范晔等并不热心于此。到了宋孝武帝朝，谢庄取代颜延之，创作了大量重要的宫廷文学作品。谢庄出身于一流高门，并且担任吏部尚书等高官，他的门第、官位远远高于颜延之，也高于范晔。除谢庄外，鲍照也生活于孝武帝朝。孝建初，鲍照一度进入宫廷，献《中兴歌》十首<sup>③</sup>；孝武帝自以为文章无人能及，鲍照故意写作鄙言累句，说明鲍照极愿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文人。尽管如此，鲍照很快就被外放为秣陵令，远离宫廷文学圈。鲍照的文学才能并不低于谢庄，但“才秀人微”<sup>④</sup>，他的门第比颜延之还差，与谢庄更不可同日而语。孝武帝之所以选择谢庄作为宫廷大手笔，除了谢庄文采华美之外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门第一流。因此，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，它表明高门士族开始在文化上向皇帝妥协、俯首（将之与同族的谢灵运相比，结论显然）。谢庄《和元日雪花应诏诗》结尾称“泽厚见身末，恩逾悟生眇”<sup>⑤</sup>，将皇帝的泽厚恩深与自身的渺小卑微相比照，表现个人对皇帝的依附和感恩；《烝斋应诏诗》中“观生识幸渥，睇服惭轸吝”<sup>⑥</sup>亦为此意。总之，谢庄以一种匍匐、谄媚的姿态进行宫廷文学写作，甘当孝武帝的侍从文人，标志着南朝高门士族在政治上败退之后，在文化上的进一步败退。

南朝初期的士族文学，可以大体分为山水文学和宫廷文学<sup>⑦</sup>。前者以谢灵运为代表，体现了鲜明而优越的士族意识；后者以颜延之为代表，体现了士族对皇权的臣服。谢庄成为宋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，标志着高门士族在文化上的败退，也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的重要转变：宫廷文学逐渐压倒山水文学，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。如前所述，宋文帝朝除了颜延之以外，大量写作宫廷文学的士族并

①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七五《颜竣传》，第7册，第2148页。

② 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六九《范晔传》，第6册，第2001页。

③ 吴丕绩先生《鲍照年谱》据《宋书·孝武帝纪》载元嘉三十年五月克京城，改新亭为中兴亭，认为《中兴歌》作于此时，为颂赞孝武帝而作。钱仲联先生否定了这一观点，认为“歌中无一语及孝武讨逆事，仍以颂文帝为近”。按，当以吴说近是，写作时间当在元嘉三十年至孝建年间（参见曹道衡、沈玉成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》，第284—285页）。

④ 锺嵘著，曹旭集注《诗品集注》（增订本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下册，第381页。

⑤⑥ 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宋诗》卷六，中册，第1250页。

⑦ 孙明君将南朝士族文学分为山水文学与庙堂文学，为表述方便，本文以“宫廷文学”取代“庙堂文学”（参见孙明君《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2年第2期）。

不多，没有形成一股创作潮流<sup>①</sup>。颜延之宫廷文学作品的影响，以及南朝宫廷文学的兴盛，实际上是从宋孝武帝朝开始的。现将宋文帝及孝武帝二朝的宫廷文学创作情况制表如下（参见[表1]）<sup>②</sup>：

[表1]

|           | 宋文帝朝  | 宋孝武帝朝   |
|-----------|---|---|
| 皇帝举行的文学雅集 | 1. 元嘉初，三月上巳，宋文帝举行曲水宴会，命释慧观及朝士赋诗。<br>2. 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，楔饮于乐游苑，与会者赋诗。<br>3. 元嘉二十九年，南平王献赤鸚鵡，普诏群臣为赋。 | 1. 孝建二年，雅集作《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》。<br>2. 大明二年，河南献舞马，诏群臣为赋。<br>3. 大明五年元日，花雪降殿庭，公卿并作花雪诗。<br>4. 孝武帝欢饮，普令群臣赋诗，逼令沈庆之作诗。               |
| 宫廷文学作家    | 1. 颜延之；2. 谢灵运；3. 范晔；4. 江夏王义恭；5. 武陵王骏；6. 袁淑；7. 谢庄；8. 王僧达；9. 张畅；10. 何承天；11. 沈演之；12. 鲍照。       | 1. 谢庄；2. 江夏王义恭；3. 鲍照；4. 殷琰；5. 颜竣；6. 江智渊；7. 徐爰；8. 张畅；9. 柳元景；10. 何偃；11. 颜师伯；12. 竟陵王诞；13. 沈庆之；14. 谢超宗；15. 丘灵鞠；16. 殷淡；17. 谢朓。 |
| 宫廷文学作品    | 颜延之十四首；谢灵运一首；范晔一首；江夏王义恭三首（2）；武陵王骏一首；袁淑一首（不存）；谢庄三首（1）；王僧达一首；张畅一首；何承天三首；沈演之二首；鲍照三首（2）。共三十四首。  | 谢庄十五首（3）；江夏王义恭四首（2）；鲍照三首（1）；殷琰一首；颜竣二首；江智渊一首；徐爰二首；沈庆之一首；谢超宗一首（不存）；丘灵鞠一首（不存）；殷淡一首；谢朓一首（不存）；佚名二首。共三十五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宋文帝朝共三十年，孝武帝朝不满十二年，然而无论是帝王雅集的次数，还是宫廷文学作家的数量，孝武帝朝皆超过文帝朝，由此可见孝武一朝宫廷文学创作之盛。除此之外，另有二事可为佐证。一是宋孝武帝模仿相传为汉武帝召集群臣所作的柏梁体诗，这在以前帝王中尚且未见，其后梁武帝、梁元帝皆有效仿。二是谢庄受孝武帝之命，采用“以数立言”的方式创作了《宋明堂歌》，这对南齐、北齐的雅乐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<sup>③</sup>。宋文帝朝比孝武帝朝多出近二十年，然而无论从作家、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学活动、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来看，孝武一朝都超过了宋文帝朝。因此可以说，南朝宫廷文学的兴盛始于宋孝武帝朝。

宫廷文学在宋孝武帝朝兴盛，也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的重要转变：宫廷文学逐渐压倒山水文学，成为士族文学的主流。作此判断，主要依据有三：

其一，文人集会地点大体由地方山泽转移至宫廷庙堂。宋文帝朝，出镇藩王为文人的聚集提供

① 有学者指出“生活在元嘉中、后期的诗人莫不写颂美的应制诗”，并举谢庄、范晔、袁淑、鲍照为例，说明元嘉中、后期出现了以颜延之为代表的“时代性诗潮”。按，该说似有夸大之嫌，且谢庄、鲍照的许多应制诗写于宋孝武帝朝，范晔仅有一首应制诗存世，袁淑一首也没有，很难称之为“诗潮”（参见吴怀东《颜延之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1998年第4期）。

② 关于此表的若干情况，说明如下：一、同一作家于宋文帝、孝武帝朝都参与宫廷文学写作，则分别计数；二、同一作家同题作品有多首，仅按一首计数，如鲍照《中兴歌》十首仅计为一首；三、计算宫廷文学作品数量时，作家后面的数字表示总数，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创作朝代存疑的作品数量；四、《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》为联句诗，计为一首；五、宋文帝、孝武帝举行文学雅集的情况，主要参见罗建伦《宋孝武帝刘骏文学雅集述略》（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12年第4期）、《宋文帝刘义隆文学雅集述略》（《云南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5期）。

③ 参见《“以数立言”与九言之兴——谢庄〈宋明堂歌〉文体新变考论》；李晓红《南朝雅乐歌辞文体新变论析——以五帝歌为中心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4年第5期。

了条件,促进了山水文学的创作。如临川王义庆出镇荆、江二州,召集大批文人,登山临水,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山水诗<sup>①</sup>。此外,宋文帝朝尚有不少由士族主导的文人集会,如谢灵运与谢惠连、何长瑜等人“以文章赏会,共为山泽之游,时人谓之四友”<sup>②</sup>,这种山泽之游对山水文学的写作当有裨益。《水经注》载谢灵运与谢惠连常游若耶溪上,“作连句,题刻树侧”(转引自顾绍柏《谢灵运集校注》,第124页),可为明证;谢惠连《三月三日曲水集诗》写“携朋适郊野”所见山水景色,也可见“山泽之游”对山水文学写作的影响。此外,尚有徐湛之出镇南兖州之时修整广陵旧城,“招集文士,尽游玩之适,一时之盛也。时有沙门释惠休,善属文,辞采绮艳,湛之与之甚厚”<sup>③</sup>,当亦有山水文学之作。由此可见,宋文帝朝的藩王和士族领袖为文人的聚集提供了条件,这种地方性的山泽之游对山水文学的写作当有很大推动。然而孝武帝欲削弱王侯,抑黜诸弟<sup>④</sup>,孝武一朝再未出现如临川王义庆、庐陵王义真一般招集文士、与之周旋的藩王。此外,也少见如谢灵运、徐湛之一般聚集文士进行山水文学创作的情况。相反,孝武帝加强了对士族文人的吸纳,举行了频繁的宫廷集会与集体写作活动。从宋文帝到孝武帝,士族文人的聚集与写作场所,呈现出由地方山泽向宫廷庙堂集中的倾向。

其二,高门士族对宫廷文学创作态度的转变。如前所述,谢灵运放弃宫廷文学作家的身份而以山水诗著称;范晔有资格、有才能写作宫廷文学,却“耻作文士”,没有大量创作宫廷文学作品;以文才著名的袁淑自称要为宋文帝献上《封禅书》,结果不仅不见《封禅书》,反而留下了《鸡九锡文》《驴山公九锡文》《劝进笺》等明显含有讥讽帝王意味的作品。可知在宋文帝朝,尚有某些高门士族对宫廷文学创作并不热心,甚至稍有排斥。到了宋孝武帝时期,高门士族不再排斥宫廷文学创作,甚至有主动迎合的倾向。谢庄向孝武帝禀报其园林降下甘露,集花雪于衣,致使公卿并赋花雪诗,都显示出对孝武帝的迎合。除此之外,谢庄有意培养、展示其子谢朓的文学才能,谢朓也在孝武帝出游姑孰时受诏作《洞井赞》,深受孝武帝夸赞。另如谢灵运之孙谢超宗,因作宣贵妃诔而得孝武帝称赏,并成为大明、泰始年间宫廷文学创作的中坚人物。从灵运到超宗,亦可见高门士族态度之转变。

其三,创作风气的变化。《宋书》本传载,谢灵运自永嘉还居始宁,“每有一诗至都邑,贵贱莫不竞写,宿昔之间,士庶皆遍,远近钦慕,名动京师”<sup>⑤</sup>,可见谢灵运山水诗在元嘉年间<sup>⑥</sup>的盛行情况。与之相反,颜延之创作的辞藻绮丽、典故繁复的宫廷文学则被目为“错彩镂金”“雕缛满眼”。然而到了宋孝武帝大明年间,颜延之、谢庄的“繁复”风格影响甚大,“于时化之”,而谢灵运山水诗派则“江河日下”(参见《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》)。两相比较,可见孝武帝朝山水文学的式微与宫廷文学的兴盛。之所以如此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孝武帝对文学之士的赏爱和拔擢。江智渊由于文采斐然而被孝武帝“深相知待,恩礼冠朝”<sup>⑦</sup>,受到特殊接待;丘灵鞠、丘巨源、檀超、谢超宗、殷淡、韩兰英皆

① 刘义庆出镇荆州时作《游鼇湖诗》,镇江州时有登山赋诗活动,吴丕绩认为鲍照《从登香炉峰诗》为元嘉十六年随从义庆登庐山所作,钱仲联、范子烨认为《登庐山》《登庐山望石门》《望孤石》诸诗也是此年所作(参见赵立学《南朝刘宋诗风演变研究——从文学交往活动的视角考察》,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,第125页)。

② 《宋书》(修订本)卷六七《谢灵运传》,第6册,第1941页。

③ 《宋书》(修订本)卷七一《徐湛之传》,第6册,第2019页。

④ 参见《宋书》(修订本)卷六一《武三王传》(第6册,第1799页)、卷八二《沈怀文传》(第7册,第2309页)。

⑤ 《宋书》(修订本)卷六七《谢灵运传》,第6册,第1918页。

⑥ 谢灵运还居始宁时为宋少帝景平元年秋,但“修营别业”及山水诗的大量写作,当在宋文帝元嘉元年以后(参见《谢灵运集校注》,第428—433页)。

⑦ 《宋书》(修订本)卷五九《江智渊传》,第6册,第1758页。

因文才而被孝武帝所称赏或擢用<sup>①</sup>。如此一来，当时形成了“宋孝武好文章，天下悉以文采相尚”<sup>②</sup>的局面，这种“文采”当然更多的是指向宫廷文学之作。

宋孝武帝朝宫廷文学的兴盛，除了孝武帝的推崇、提倡以外，谢庄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。首先，谢庄出身华贵，官位显达，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写作宫廷文学作品，受到孝武帝的称赞、提拔，对士族文人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。其次，谢庄宫廷文学写作的诸多艺术技巧，为其他士族文人提供了效仿的对象。颜延之创造了一种辞藻华美、典故繁复的写作手法，谢庄加以继承，并推波助澜，在孝武帝大明年间形成了兴盛一时的创作潮流。《诗品》所云“颜延、谢庄，尤为繁密，于时化之”（《诗品集注》[增订本]，上册，第228页），可为明证。前述谢庄所作《宋明堂歌》对南齐、北齐雅乐创作的影响，也是一例。另据《南史》载，谢庄为宣贵妃作哀策文，孝武帝“卧览读，起坐流涕曰：‘不谓当今复有此才。’都下传写，纸墨为之贵”<sup>③</sup>。之所以“都下传写，纸墨为之贵”，一方面当然由于谢庄此文凄怆精美，另一方面也由于文章得到了孝武帝极高的赞赏<sup>④</sup>。都下之人竞相传写此文，表明众人想要欣赏、学习谢庄的创作手法，或许也有借此获得孝武帝赏识的想法。除谢庄作《宣贵妃诔》之外，谢超宗“作诔奏之”<sup>⑤</sup>，丘灵鞠“献挽歌诗三首”<sup>⑥</sup>，殷琰作《宣贵妃诔》，江智渊作《宣贵妃挽歌》。由于文献不足，难以确知创作时间的先后，不过从谢庄的地位以及孝武帝多次命其写作诔文的情况来看，谢庄很有可能是最早写作宣贵妃诔之人；谢超宗、丘灵鞠等人当是受到谢庄的影响，才创作了诔文、挽歌，这与“都下传写，纸墨为之贵”的说法是契合的。总之，孝武帝朝宫廷文学大盛，谢庄对此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。宋孝武帝之后，宫廷文学继续发展，齐梁之时已蔚然成风，宫廷文学遂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。

### 余论：南朝皇权振兴与士族文学之演变

东晋时期，高门士族获得平行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力，这种门阀政治可以视为古代皇权政治的一种“变态”。到了南朝，这种“变态”的门阀政治逐渐向皇权政治回归。与之相应，帝王的权力逐步增强，士族的权力则趋于衰微。从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南朝的皇权政治，士族从独立于皇权之外的门阀“贵族”，转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帝国官僚，这一变化对南朝士族的政治遭遇、政治选择、思想心态等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进而影响到士族的聚集形式、文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文学创作的动机、题材、主旨、风格，推动了南朝士族文学的演变。

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，宋孝武帝朝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孝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，削弱臣下之权，使得南朝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孝武帝死后，这种专制意识及权力结构进一步深化，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权力调整，使得帝王与士族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。其外在表现，便是宋、齐二朝频繁的政治动荡，以及大量士族被帝王所杀。梁武帝鉴于宋、齐二朝之乱，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手段来调整权力结构，皇权与士权重新达到平衡，而皇权已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。陈朝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士族完全无力与帝王抗衡。总而言之，南朝皇权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，宋孝武帝和梁武帝是皇权振兴过程中的两个关键。

① 参见《南齐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二《文学传》（第3册，第981、986、983页）、卷三六《谢超宗传》（第2册，第707页）、卷二〇《皇后传》（第2册，第438页），《宋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九《殷淳传》（第6册，第1746页）。

② 《南史》卷二二《王俭传》，第2册，第595页。

③ 《南史》卷一一《后妃传上》，第2册，第324页。

④ 有学者认为，谢庄重除吏部尚书，“皆此一诔之功”（参见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》，第320页）。

⑤ 《南齐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三六《谢超宗传》，第2册，第707页。

⑥ 《南齐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五二《文学传》，第3册，第981页。

随着南朝皇权的逐渐回升，士族的政治、军事权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。从身份上看，高门士族由独立于皇权之外的“贵族”，逐渐演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帝国官僚；从行为上看，高门士族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政治舞台，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文化方面；从文化上看，高门士族由“文化贵族”<sup>①</sup>逐渐转变为服务于帝王的宫廷侍从文人。刘宋初期，帝室的文化修养显然是低于门阀士族的，为了迎合、拉拢士族，刘裕不得不“被动地‘爱文’”。到了南朝后期，士族失去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方面的优势，不得不以文学才能取悦帝王<sup>②</sup>，获取官位，也可以说是“被动地‘爱文’”。这种转变的关键原因，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，以及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变化。

如上所述，宋孝武帝朝是南朝政治、文化变革的关键期。谢庄处于这一巨大变动之中，做出了比较明智的选择。宋初，谢庄族叔谢灵运欲“参时政”，而“文帝唯以文义见接，每侍上宴，谈赏而已”，最终被杀。谢灵运的悲剧，在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门阀政治时代，不能适应皇权政治。谢庄所为与谢灵运正好相反，即避“时政”，唯以“文义”侍上。谢庄之子谢朓“有虚名”而无“治实”<sup>③</sup>，梁武帝却大加拔擢，以之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至梁武帝时，皇权极盛，士族亦自以空名居于朝廷。谢灵运、谢庄、谢朓三人之经历，正可见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，士族地位、处境之变化。而谢庄处于变革的关键期，能辞吏部尚书、以文学侍奉孝武，故得保全。孙明君认为谢庄不愿居选职的原因是“他不满当时的吏部尚书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傀儡，是故用辞职之举表达自己的抗议”，此举“显示出高门士族精英对孝武帝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抗争”（《谢庄〈与江夏王义恭笺〉释证》）。孙氏对谢庄辞选职的原因颇多精辟之见，然而似乎过高地夸赞了谢庄的精神气节。实际上，谢庄在大明之世心甘情愿地当了好几年“傀儡”，且谢庄谓沈怀文曰“卿每与人异，亦何可久”，可见谢庄不过欲保全性命而已。然而在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过程中，在门阀贵族向帝国官僚转化的过程中，谢庄做出了明智的选择，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孝武朝以后，高门士族之选择多有如此，如徐孝嗣“爱好文学，赏托清胜。器量弘雅，不以权势自居，故见容建武之世。恭己自保，朝野以此称之”<sup>④</sup>，与谢庄立身之道无异。

综上所述，宋孝武帝朝是南朝政治、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，而谢庄的政治抉择代表了高门士族由“贵族”向官僚、由政士向文士的转变，谢庄的文学创作则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。南朝皇权振兴以及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变化，对南朝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，谢庄在宋孝武帝朝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，正是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。

[作者简介] 何良五，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。发表过论文《永明体声律的一种特殊形式——以沈约、谢朓为中心》等。

(责任编辑 李 科)

①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，中古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，即儒学和礼教（参见牟发松《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“六朝隋唐论”试析》，《史学理论研究》2002年第3期）。

② 唐燮军称：“尽管沈约以文才为凭借的求仕方式，既不同于周盘龙的以军功起家，也有别于纪僧真的以吏干发迹，但他的政治取向与周、纪两人其实并无任何差别，并同样表现为对皇权的依附。”（唐燮军《诗人之外的沈约：对沈约思想与生平的文化考察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6年第4期）除了沈约以外，齐梁时期还有大量凭借文才求得帝王赏识、获取官位的士族，文士手中的笔和将士手中的刀一样，都是取悦帝王的工具。

③ 姚思廉《梁书》（修订本）卷一六《王亮传》，中华书局2020年版，第1册，第300页。

④ 《南齐书》（修订本）卷四四《徐孝嗣传》，第3册，第859页。